

目 录

宁陵县沿革·····	张履新 (1)
我在宁陵的革命活动片断·····	王建一 黄西祯整理 (4)
我所知道的贾兼善同志·····	王伟亭 (8)
柳河敌工站工作的回忆·····	李东成 (15)
宁陵学生运动二、三事·····	范友信 (21)
杨树堂在宁陵二、三事·····	张履新整理 (25)
奔袭宁陵县城·····	刘传书 (28)
中原大战在宁陵·····	郭宗正 (30)
民族瑰宝绽新花—宁陵武术简况·····	丹化章 (34)
唯物主义思想家吕坤·····	刘传书 (42)
忆宁陵三七届简师同学的罢课	
游行活动·····	刘伯敏 郑明善 张化昆 (46)
豫剧在宁陵的形成与发展·····	李汉德 (48)
宁陵县清代、民国时期教育事业概况·····	县志办供稿 (51)
辛亥革命老人李心梅·····	县志办供稿 (57)
国民党在宁陵的建立与发展·····	县志办供稿 (60)
宁陵县中医事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县志办供稿 (62)

宁陵县历史沿革

张 履 新

宁陵县位于河南省东部，东与商丘县接壤，西和睢县毗邻，南同柘城县交界，北枕黄河故道与民权缘连。全县总面积785.5平方公里，南北长37.5公里，东西宽19.5公里。

宁陵县虽小，但历史悠久。她象整个中原大地一样，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自有人类以来，我们的祖先葛天氏部族就在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1987年，本县程楼乡丁固堆村所发现的一处内涵丰富的龙山文化遗址，其出土陶片和灰土证明，这里四千多年前不仅已有人类定居，而且是个人口比较集中、且具有相当规模的手工业作坊。这对于研究探索龙山文化的分布与发展，具有一定的考古价值。夏时（约公元前21—前16世纪），宁陵为古葛国。夏末（约公元前16—前11世纪），在商汤推翻夏桀的战争中，葛国第一个为商汤所征服，而成为商的属国。西周时期（约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葛的后裔又被封到葛国故地，宁陵仍属葛国。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年），宁陵仍为葛地，魏国以称宁邑。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年），宁陵以曰信陵，属魏。战国末年（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建立秦王朝，宁陵称宁陵城，属砀郡。西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始置宁陵县。至公元9年，王莽篡政，建立新朝，改宁陵之名为康善县。东汉建武元年（公元25年），随着王莽的失败，而废康善

县，又复宁陵县之名。东汉和帝永元十一年（公元99年），在种龙乡置己吾县，与宁陵县并存，属兖州刺史部陈留郡，辖直阳、大棘、自鄢三个乡。东汉后，魏、蜀、吴三国鼎立，大乱百年。宁陵、己吾皆在魏地，而宁陵县属豫州部梁国，己吾县属兖州部陈留国。武帝灭魏后，建立西晋，取消己吾县，宁陵县仍属豫州梁国。南北朝时期（公元420—479年），宁陵在宋地，属南豫州南梁郡，后属豫州谯郡。公元479年，肖道成建立南齐，宁陵属豫州北谯郡。北魏孝明帝孝昌年间（公元525—527年），宁陵失陷，后又改复，宁陵属南兖州谯郡。公元534年，孝静帝元善见建立东魏，改宁陵县为己吾县，属梁郡。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建立隋朝。开皇六年（公元586年）复置宁陵县，属梁郡。公元681年，唐高祖李渊灭隋建唐，改郡为州。太宗元年（公元627年），合并州县设道，宁陵属河南道宋州。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宋州为睢阳（今商丘）郡，宁陵属之。唐亡之后，进入五代（公元907—960年），后梁、后唐时，宋州为宣武军，后晋、后汉、后周时，宋州为归德军，宁陵皆属之。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宁陵县属京西路应天府（今商丘），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开封府襄邑县（今睢县）升为州，名曰拱州，拔宁陵县属之；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复属应天府；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又隶拱州；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宁陵复隶应天府。金朝（公元1127年—1234年）建立后，宁陵属南京路归德府。公元1271年，元朝建立，宁陵属河南江北道汴梁路归德府。公元1368年，明朝建立，宁陵县属河南布政

司开封府归德州；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归德州复升为府，宁陵属之。公元1644年，清朝建立后，宁陵属河南省归德府。

公元1912年，辛亥革命成功，彻底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建立中华民国，宁陵属河南省开封道。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宁陵属河南第二督察专员公署。1938年，日本侵略军占领河南，宁陵属河南豫东道。1945年抗战胜利后，废豫东道，复置河南第二行政区商丘专员公署，宁陵属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宁陵属河南省商丘行政区专员公署；1959年，随着商丘专员公署的撤销，并入开封，宁陵随隶属于开封专员公署，1960年5月，撤销宁陵建制，并入睢县，1961年7月，恢复宁陵县，同年10月，商丘专署恢复，宁陵隶属商丘专员公署（后改行政公署）至今。

（本文作者为县政协委员）

我在宁陵的革命活动片断

王 建 一

我是宁陵县阳驿乡平洛村人。中共宁陵县委党史办的同志让我谈一下我在家乡宁陵的革命活动，回忆往事，思绪万千。从何谈起呢？就从1940年谈起吧。

接受任务 回宁工作

1940年2月，我在豫皖苏区彭雪枫部下当三团二营一连指导员。有一天，具体日子记不清了，领导找我谈话，要我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没说明到哪儿去。我当即表态：“只要是工作需要，我一定服从分配。”第二天，领导通知我，让我只身一人回宁陵工作，接着，说明这样分配的原因，并严肃交待了任务：“根据上级指示，为了抗日，必须把水东地区打通，将睢杞太和豫皖苏两块根据地连结起来，宁陵是交通要道，你家住宁睢交界的平洛村，好隐蔽，便于开展群众工作。你的主要任务是：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观察了解敌情，将敌内动态及群众对抗日救国的态度，定期向豫皖苏区党委汇报。在那里站住脚以后，慢慢地向东、向北陇海铁路沿线开展地下工作。”

广交朋友 开展工作

回到宁陵以后，我就按照上级党委的指示，立即开展了工作。为了将收集到的情报能及时地送给上级，并与上级经常保持联系，我首先找了一个交通员王建谋(外号王老大)。

王建谋有勇有谋，多次出色地完成了我交给他的任务。为了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开展党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我到过石桥、逻岗和柳河一带，结交了不少朋友。有石桥乡乔八村的安久贤，有逻岗乡大槐树村的黄友德，有牛庄村的牛耀武，有阳驿乡郑楼村的郑密堂。

1941年8月，奉上级指示，我调离宁陵，回水东军分区独立团工作。与此同时，水东特委派贾达夫（贾兼善宁陵县小贾楼村人）同志来宁陵任宁柘商中心县委书记。由于叛徒的出卖，他于1942年3月被日本特务机关逮捕，同年秋在济南遇难。

频频出击 狠揍敌人

1944年8月，党中央、毛主席根据当时形势的发展，指示新四军第四师西进，恢复豫皖苏边区。我水东地委决定，从睢杞太中心区抽出力量东进，一方面，迎接四师彭（雪枫）、吴（芝圃）首长；另一方面，向东开辟新的游击区，建立抗日政权，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

1944年9月，水东地委和军分区，为了进一步有力地开辟宁柘商地区，由地委书记李忠一、军分区参谋长陈子植、独立团团团长王广文率领分区武装进入这个地区活动。部队活动的方式是：大部队开辟，小部队坚持，主力部队集中，地方武装分散，以整化零，部队开辟过的地方，都相继建立了地方区乡政权。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发动内战妄图消灭共产党。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我水东地委根据上级指示，决定在宁柘商三县结合部建立一支人民军队，彻底改变这里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的情况。

1946年7月，军分区部队配合独立旅打过柘城后，到永城休整。8月永东地委书记王其梅亲自宣布上级决定，正式成立宁柘商支队，孙其昌同志任支队长，我任政委。由我们带20余人，加上睢县两个小区队总共90余人，支队组建后重新开辟宁柘商地区。队伍走到商丘县勒马集，组织了第一个战斗。我们巧妙化装，悄悄进寨，首战告捷，一举消灭了勒马乡伪乡公所全部敌人，缴获枪20余支。我们拔掉了这个钉子，当地群众无不欢欣鼓舞。尔后，部队转移到宁陵县黄岗一带活动。在黄岗西魏村召开了一个庆功会，会上宣布成立了宁陵县人民政府，经地区党委批准，我任县委书记兼县长，当时又出布告，又贴标语，热闹非常。接着建立两个区级政权：张弓区，王晓峰任区委书记兼区长；平洛区，王干国任区委书记兼区长。

由于这支年轻的支队来去匆匆，神出鬼没，忽隐忽现，当地群众视支队为“神兵天将”。9月初，随着支队影响逐步扩大，宁陵地方土顽在张弓镇北小杨庄，出动近五百名兵力，妄图趁支队立足未稳，把支队扼杀在摇篮里。面对五倍于我们的敌人，我与支队长孙其昌同志认真分析了敌我形势，决定采取重点突破，迂回包抄的战术，结果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仓惶逃窜，缴获敌机枪一挺。11月19日，支队在柘城县双庙与汉奸张岚峰部五团警卫营一个连遭遇，后边又有敌一个团的兵力尾随，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和孙其昌同志当即立断，向迎面扑来的敌人发动猛攻。20分钟即结束战斗，打死打伤敌20余人，俘敌50余人，缴获敌轻机枪4挺，小炮1门，长短枪70余支。支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机动灵活，分散活动，出敌不意，攻敌不备，频频出击，以少

胜多的游击作战方法，受到了豫皖苏军分区领导的表扬。

这年秋天，我们在大郭、王堂一带发展了一批党员，壮大了革命力量。记得有李振孟、郭茂品、郭照君、刘景元、张继春、邹心义、李景孟、刘兴顺、翟金明等并建立了党支部。同时，我们还在大郭、王堂、申屯、朱贡堂又建立了行政村，成立了农会，这样为后来的土地改革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1947年以后，我奉上级指示，调到大部队去了。

我所知道的贾兼善同志

王 伟 亭

贾兼善，字达夫，出生在宁陵县乔楼乡小贾楼村的一个中医家庭。我与他是初中时代的同学，又是同时被日寇逮捕入狱的难友。他虽然英勇牺牲45年了，但他对敌坚强斗争的英雄形象，以及对我的启发教育，宛如在目前，时时激励我奋勇前进！

1931年8月，那年他14岁。我俩分到一个班学习。他聪明好学，酷爱文艺，课余大部分时间到图书馆阅读报刊，借阅图书。当时学校办有《洪钟》校刊，他不断撰写文章，发表诗歌。“九·一八”事变，日本发动侵略，倾销日货，全国群情激愤，一致要求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他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暴行，在同学中发起组织“读书会”。高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旗帜走向农村，走向街头。他以小组长的身份，领着同学上街示威游行，散发传单，查禁日货。他的爱国行动受到很多进步教师如共产党恽子筹、邓涤尘的支持。在这国难深重的日子里，我们初中毕业了。他以公费考上淮阳师范，我入商丘高中学习，从此分手了。淮阳师范是进步青年的摇篮，在那里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0年，正当日寇践踏祖国大地，实行“三光”政策，开展“强化治安”运动的时候，兼善同志回到沦陷区的家乡，隐蔽身份（后来知道是宁柘商中心县委书记），开展

抗战救亡工作，这时我在家从事农业生产。3月的一天，他突然到我家来了，多年不见分外亲热。他谈到他淮师毕业以后，在沈丘县槐店学校当教师（后来知道是沈丘县委书记），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组织学生从事救亡运动。他还对我讲解中国近百年来受人宰割的奇耻大辱，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中国人民总是不愿当亡国奴，最富有斗争性。别看现在日本鬼子张牙舞爪，屠杀无辜人民，中国人民一旦觉醒，组织起来，一定可以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取得抗战的胜利。他的一席话，对我启发很大。临别时，他约我到他家作客。

过了一个多月，我到他家回访，谈学习，谈时事，谈敌人的暴行。当他知道我正在读《水浒》时，就给我讲宋朝的贪官污吏，官逼民反，农民不起义无法生活。他说他最喜欢鲁智深，性格直爽，专打抱不平，一身正义，无牵无挂，李逵赤贫，敢于反抗，敢于斗争。人不能小胆，象林冲、宋江那样，顾忌多，总是要吃亏的。现在有许多人研究《水浒》、《三国演义》，从中吸取经验，开展对敌斗争。临别时，他送我两本书，一本《大众哲学》，一本《饿乡纪行》。我读后，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个无剥削无压迫的理想社会，才知道人民要革命的道理。

这一年的夏秋之交，他刚到我家，日伪巡逻队到了我庄东头，我迅速从西头高粱地里溜走了。于是，我俩决定到平洛村王建一家去。王建一也是我初中时的同学，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当时在家乡一带活动。我们三人相谈甚欢。但有些机密军情我摸不着头脑。唯当谈到抗战救国，联系志士仁人，青年人的理想与抱负时‘我有领会。还谈过要组织

各阶层爱国人士和爱国群众进行武装斗争，要进城策动日伪新民会长张中干等反面人物。最后贾兼善同志说要转移到郭村集小学当教师。那里有一个联络站，专门为边区输送短缺物资，传递信息。

次年三月初，我又和贾兼善同志见面了。他说形势有变化，在郭村小学教书不适宜，转到小路庄教私塾去，可是校长不让辞退。要我去代课，因为我在家里闲着无事干。接着他分析郭村小学的形势，校长刘信琛同情抗日救国活动，大部分教师有爱国思想，不甘心当亡国奴，但缺乏领导和组织能力。王儒先（解放后曾任宁陵县税务局副局长）在那教书，思想比较进步，是咱的老同学。他与联络站（当时党的地下联络站）的郭庆华相识，准备组织一个救国会之类的团体，联络志士，揭露敌人的残暴，扩大抗日力量。

在他的鼓舞下，我走出了家门。分别时，他嘱咐我物色几个在家无事无依的青年到外学习，参加救亡工作。

我到郭村小学，暂住在王儒先的宿舍，有幸得读刘少奇在中原局的报告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竟夜阅读，手不释卷。第三天，即1942年3月9日，黎明时辰，人们还未起床，日寇突然把学校包围，把教师集中到一个屋里，由日本宪兵和伪警察持枪看管。过了几个钟头，他们将我和校长刘信琛绑起来推上了汽车。到汽车上，我一眼看见贾兼善同志站在中间，反绑着双手，满身污泥，面部血迹斑斑，但二目炯炯，怒视着汉奸卖国贼。旁边还有三个被绑着的农民打扮的人。后来才知道，一个是共产党员郭庆华（郭村人）及他的父亲郭余一，另外一个贾兼善的堂兄贾洁善。

我们被捕后，被关进朱集（今商丘市）车站道南日本宪兵

队监狱。监狱成L型，十六、七个牢房并排，每间约6平方米，前墙用碗口粗的木桩竖排着，间隔二寸许，木桩前是走廊，以便敌人流动监视。我们6个被关进不同的牢房，我与贾兼善相隔二间。每间牢房都关了10多人。房小人多躺不下，只能日夜坐着，吃饭解手不准外出。牢房内臭气冲天，熏得人恶心头晕。

第二天，听到翻译喊贾达夫的名字，我赶紧到木桩前去看。只见他神色自若，带着毫不示弱的样子从牢房的小门里走了出来。两个小时后，他回来了，面色苍白，被一个警察拖着，从木桩下面的小门里推进了牢房。很明显这是敌人对他动用了酷刑。我看着心痛地流下了眼泪。同房的一个难友对我说：“他是受了摔打的刑罚。绑着腿脚，推搡着上身，在水泥地上摔打。我曾多次被摔死过去。”第二天，鬼子又把他拉了出去，我看他走着一瘸一瘸地，但还是挺着胸膛。我担心敌人又要对他施用什么酷刑，就盯着他去的方向，心里扑通扑通直跳。一个时辰以后，他回来了。衣服被撕得一块一块的，满身都是血痕，难友们一看就知道这是狼狗咬的。敌人知道他是个重要人物。为了从他嘴里得到地下共产党的组织情况，就每天提审他。这样他便一天天消瘦了，面色苍白，形容憔悴，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有一次，两个鬼子把他生拉硬拖着塞进了牢房。这次刑讯更残酷了。有的难友说是电刑，有的说用棒打，有的说是用皮靴踩，也有的说是多种刑法并用。狱中多数人都在用湿润的眼睛和满腔怒火互相激励着，迸发出一个共同心声：“敌人越是残忍，我们越要坚强。一定要象他那样，决不能跪在敌人的屠刀下求生”。在这以后，一连几天没有听到提审他的消息，也无从打听他在狱

中的情况，只有想啊想……突然，在一天的早晨听到喊贾达夫的名字。我连忙爬到前面去看，只见一个翻译把一碗雪白的大米饭送给他吃。我开始想不开，以前都是给他半碗高粱米，今天为什么给他白米饭？是他投降了？不！他决不会投降。一定是鬼子耍奸计，改用软的，怕贾达夫同志死了，供不出他们需要的东西。

在狱中40多天过去了，我被押到贾达夫同志的牢房里。我们见面双手紧握，泪如泉涌，彻夜相谈。这时我才真正知道敌人对他使用酷刑不成，就改用金钱、高官厚禄收买他。但敌人的种种阴谋，都被具有坚强革命意志的贾达夫同志挫败了。他说：“我尝尽了鬼子的摔打、狗咬、电刑……没有屈服；高官厚禄更不能征服革命者的意志。中国人应具有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高贵品质。”当他谈得激昂慷慨、兴致勃勃的时候，随口吟出“抗日烽火燃中州，中华儿女怒气昂。钢筋铁骨锻炼就，正义岂能怕杀头”的诗句。然后他又慢慢地讲起40多天来与敌人斗争的经过。敌人对他使用酷刑，在老虎凳上，敌人问他地下党组织的情况，他斩钉截铁地说：“要头可以，要党组织情况不知道！”敌人说：“你不可惜你年轻的生命吗？”他说：“我活25岁了，要杀要砍随便！”敌人的各种刑罚用完了，看硬的不行，就用软的一套。一天，日寇宪兵司令佐久间，假惺惺地说：“只要你说出组织的机密，保举你作知事一类的官儿。”他严辞拒绝说：“中国人是有骨气的，从来不会屈服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收起你们的鬼把戏吧！”鬼子宪兵司令看不行，就找他们培养的乐同部队上校司令、铁杆汉奸宋大为设宴和他交朋友。宋大为讲“大东亚共存共荣”的臭道理，说只要跟着他

干，他可以从宪兵队要出来，一旦“悔过自新”，金票大大的，吃喝玩乐任其行，还可以当县长、新民会会长等等。面对敌人的诡计，他拍案而起，怒视着宋大为，理直气壮地借此机会慷慨陈词，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大讲日本帝国主义的必然灭亡，中国人民必然胜利，汉奸卖国贼必将要受到正义的审判，其下场是可悲的。宋大为被骂得汗流浹背，狼狈不堪地悻悻而去。贾达夫同志谈到这里，看我听得激动，便又耐心地讲下去：“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要看到希望，即使是牺牲了，也要死得有价值。”当我们谈到叛徒经其昌时，他愤愤地说：“在严酷的革命年代，逃避斗争，妥协投降，也许可以苟且偷生，但在我看来这种人是可耻的，也决不会有好下场，最后必将受到人民的审判！”他又说：“在残酷的斗争面前，我没有象经其昌那样出卖同志，我没暴露组织的秘密。相反，我捍卫了党的伟大事业。”几天以后他深情地对着我说：“鬼子已经伎穷，无奈我何。我决无生还之理！等你出狱后，见到王建一、王儒先等同志，勿以我为念，要继续战斗下去！”在这种情况下，贾达夫同志仍然想到革命，想到同志。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丝毫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但他却为不能战死在抗日疆场而感到终生遗憾。他具有革命者的高贵品质和情操，他是党的优秀党员。有了他，中华民族感到骄傲和自豪。到了5月底，鬼子把贾达夫同志押送济南宪兵总部，不久就壮烈牺牲了。

今天缅怀先烈，心潮起伏，展望未来，信心百倍。我决心在革命先烈的英雄形象鼓舞下，沿着党的路线继续前进。现在我虽进入风烛残年，但我也要有一份热，发一份光，将

我的余生贡献给先烈们未竟革命事业，以告慰于兼善同志的英灵。

柳河敌工站工作的回忆

李 东 成

1938年5月以后，商丘所属各县相继沦陷。嗜血成性的日本侵略者，采取最野蛮的法西斯手段，对我无辜同胞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所不用其极。人民群众颠沛流离，痛苦地挣扎在死亡线上。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为了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拯救敌占区人民，组织和团结各阶层进步力量一致抗日，我鲁西南地委决定在商丘、开封之间建立敌工站，了解和掌握陇海铁路沿线日本的动向，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武装群众，抗击日本侵略者。

1939年7月，我在冀鲁豫随营干校学习六个月刚刚结业，鲁西南地委委派曹县县委书记袁福荣同志找我谈话，向我讲明了当时的形势，又讲了党组织派我去柳河火车站建立敌工站的决定，并认真细致地帮助我分析了在柳河建立敌工站的有利条件：一、柳河是个小站，不被敌人重视，且距商丘较近；二、我原籍在山东曹县，但长期在柳河居住，情况熟悉；三、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有相当一部分亲朋故旧和同学，便于开展工作。谈话结束后，我便整点行装，离开部队，告别朝夕相处的首长和战友，带着党的嘱托和人民的期望踏上征途。

我来到柳河后，开始住在我姐家，姐夫赵白录怕我暴露了目标，便介绍我去柳河煤场当店员。当店员虽有利于

隐蔽，但因拴得过死，无法开展工作。组织上考虑到这种情况，便拿出六、七十块银元在柳河开了一座小型旱烟店。因为旱烟要从山东曹县进货，有利于同上级经常保持联系，这就给我更好地开辟这里的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开始，我首先给我在小学上学时的挚友杨敬信、冯建顶取得了联系。他们对我党团结抗日的主张都十分敬佩，并决心在党的领导下，联系更多的民众，抵御外患，直至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为了迅速在柳河站住脚，并开创抗日新局面，经他二人的介绍，很快和柳河一带的吕培成、逻岗北部的冯万选取得了联系。这两个人都曾是联防队的头目，在当地颇有影响，有人有枪，并都有抗日的行动。经过工作，他们愿意和我们一起抗日。在征得组织上同意后，由我冀鲁豫支队二大队出面，委任冯万选为陇海铁路第一支队司令，吕培成为二支队司令。这两支武装力量在发展壮大，我对这一前景也充满了希望。但是这两支武装力量，都属于自发组织起来的，缺乏作战经验，而且乡土观念大，流氓思想严重，习惯于那种夜聚明散的打家劫舍，而不愿意接受党的纪律的约束，公开拉起队伍和日本周旋。后来，他们便自行其事，于1942年被日本抓获，杀害于柳河。

在这以后，我便和家在民权孙六口我小时的同学李瑞同取得了联系，并在孙六建立了联络点。1940年春，通过李瑞同的关系，同当时在和平救国军中的李宗儒和李宗孔取得了联系，并在地方上发展进步青年杨天保、胡立本、李友德、丁忠兴、李思圣等人在我孙六联络点领导下开展活动。1940年底，在柳河建立了党支部，（宁陵县第一个党支部）我任支部书记，张清其任组织委员，胡立本任宣传委员。